

关爱让维权之花悄然绽放

——读徐良文的《法律的阳光》

郁春红

中国首部记述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报告文学《法律的阳光》由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入选江苏省作家协会“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”项目。

《法律的阳光》以江苏省法律援助基金会资助的农民工典型法律援助案例为主线，记录数年间法律援助基金会帮助农民工讨薪、维权道路上所走过的艰辛与曲折，书写法律援助律师、法律援助工作者“乐为穷人打官司”的大爱情怀，书中讲述的一个个关爱故事，让我们欣然地感到“维权之花”正悄然绽放。

该书作者徐良文是位著作颇丰的报告文学（含传记文学）作家，又是位“老司法”，曾任江苏省法制新闻协会秘书长。多年来，他关注法律援助与农民工维权这一重大问题，具有丰富的经验积累，为撰写此书，历时五年，经过深入采访并精心梳理，五易其稿，终于成书。书中通过“司法援助，为一个农民工而启动”“保护你的健康权”“法律的温度”“法律援助点亮人生的红

烛”“为弱势群体办实事”“法律援助永远在路上”等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展示出典型案例的曲折复杂，通过法律援助工作者的热情服务，切实解决了许多农民工打官司难的问题，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法律援助工作者捍卫公平正义的关爱情怀，凸显了中国法律援助与社会治理的筌路蓝缕，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大道之行。

“许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往往才是真实的世界。”作者坦言，农民工往往做的是城市中中最苦的活，吃的是最差的饭菜，住的是最简陋的房子，而一年挣得的血汗钱却得不到保障，被一些黑心的建筑商、包工头克扣、拖欠，甚至遭受暴力侵害……书中例举的案例中，最突出的是劳动报酬纠纷、工伤损害赔偿和交通事故等三种类型。作者在颂扬公平正义的同时，揭示了违法犯罪分子的丑恶。在书中，我们听到了农民工兄弟的控诉，更为农民工兄弟的善良而感动。一桩桩令人发指案件终得以公正处理，

其背后是一位位满腔正义的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辛勤付出，他们用专业知识，用本心去做事，做好事，做好事，做对得起“天地良心”之大事！作者饱含深情地展现了法律援助工作者一腔正气、铁骨铮铮，他们所做的一件件、一桩桩体现法律援助精神的典型案例，像一缕缕阳光沐浴着无助的弱者，是那么的灿烂，又是那么的温暖，正义得到伸张，悲剧得以阻断，一个人，一个家庭获得挽救，他们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的事业中，所作出的无私奉献，令人在感佩之余，引发对人生追求和价值观的思考。

作者在谈论《法律的阳光》一书的写作过程中，深感“这是一件很繁杂且费力的事。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农民工维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。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、结构复杂、分布广泛，他们在维权、经济收入、个人能力等方面仍处于弱势，在权益受到侵害时，没有能力独自运用法律武器来合法维权。而作为司法制

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法律援助通过向这些缺乏能力、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，使他们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，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。

这对作家来说，既是义务又是责任，作者认为，只要横下一颗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心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关键是有没有这个决心，是不是真心为他们着想。

作者围绕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，从不同的角度切入，深入采访、细致了解，胆识兼具、秉笔实录，告诉世人，警醒社会，法律不会缄默，更不会迟到与缺席，更不能让善良与良知蒙垢。在法律援助的道路上，不仅需要方方面面为此不懈地努力，为弱势群体及时提供法律的支撑，而且需要大力弘扬与彰显法律援助正义使者的力量，亟需专业人士、热心人士的付出与耕耘，同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农民工的法律保障制度，使劳动者得到应有的尊重，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晴朗的天。



《偶然的创造》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在英国《卫报》的专栏合集，也是作家首次尝试自传性书写。通过52篇凝练生动的短文，作家回忆了对其有特殊意义的诸多经历、人和物，阐释了自己对恐惧和嫉妒、成长和衰老、身体与写作、谎言和隐私等主题的看法。对于费兰特的读者而言，这本书是除其作品、访谈和书信之外，抵达作家一直拒绝示人的面孔和自我的珍贵文本。

《偶然的创造》(意)埃莱娜·费兰特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4月版)

虚构与真实

我无法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画一道分割线。比如说，我构思了一个故事：我当时四十八岁，那是冬天，我在一个空荡荡的乡下房子里。我在淋浴房里，水龙头关不上，热水已经用完了。我真的经历过这种事吗？没有。我认识的人经历过这种事吗？是的。这个人当时是四十八岁吗？不是。那我为什么要以第一人称来写这个故事，好像它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呢？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夏天，我却说是冬天？为什么当时还有热水，我却说热水已经用完了？为什么在真实情况下，那人在五分钟内就脱身了，我却让那女人在浴室里待了好几个小时？为什么我要用很多其他插曲、其他情感、焦虑和可怕的想法把故事复杂化呢？其实他们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，那是一件很简单、无关紧要的小事。

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正在试图按照果戈理总结出的原则，写一部长篇小说。他是这样说的：给我一件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，我都可以写出一场大闹剧。但我觉得这个回答不尽人意。为了让自己看清楚这件事，我假定自己带着相反的意图。假定说，我要写一部大闹剧，我厌烦了到处搜寻奇闻趣事，我想严格按照我朋友的经历来写。于是我去找她谈，我会带着iPad，甚至会录制一段视频，我想尽可能尊重事实，和她讲述的故事高度吻合。

我回家开始创作，我反复阅读我记的笔记，一遍又一遍看视频，一遍又

一遍听录音。但我很不安，我朋友真的把事情经过如实告诉我了吗？为什么当她谈到了问题的淋浴房时，会语无伦次？为什么她刚开始说得头头是道，后面会出现病句，甚至是方言的味道？为什么她说话时，总是望向右边呢？右边有什么东西？那是在录像中、在现实中无法看到的。当我动笔写时，我要怎么写呢？我会努力猜想右边隐藏着什么吗？还有她对我隐藏了什么吗？我会整理她的语言吗？我会模仿她语言中的混乱吗？我会突出她的语无伦次吗？将其夸大，让它变得更明显吗？我会怀疑她讲的故事，提出一些假设来填补空白吗？

总之，作品的可信度离不开我的想象力，也需要通过想象实现一种连贯性。需要赋予故事条理和意义，在必要时，甚至要模仿缺乏条理和无意义的语言。任何文学创作，因为它本身的性质，总会带有某些虚构、人工的成分。正如弗吉尼亚·伍尔夫所说，差别在于，虚构的故事最终能捕捉到多少真相。

(选自《偶然的创造》)



好书分享 请您推荐

书香影

冬天可取暖，夏天可纳凉，累了能歇脚，充电、饮水、Wi-Fi等可以免费使用。近日，句容市图书馆在帕提亚广场和吾悦广场开放的“句暖心小哥驿站”成为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一个温馨的家。此阅读驿站以关注“小哥们”的阅读需求为出发点，以公共图书馆供给文献资源、提供服务为支撑，为他们提供周到、便利、温暖的阅读服务。近年来，句容市图书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作用，将阅读设施从中心图书馆向老百姓身边延伸，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不断转型升级。目前，该馆总分馆建设阅读服务点达到249个，“全民阅读书香句容”品牌愈发响亮，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“国家一级图书馆”。

严洁 刘新强 摄



闲读之乐

田秀明

唐代王建有诗云，“竹烟花雨细相和，看著闲书睡更多。”南唐李建勋也有诗云，“唯称乖慵多睡者，掩门中酒览闲书。”人生多闲时，如果能煮上一壶茶，慢饮细品，随手拿上一卷书，或者一张报纸，漫无目的地翻看着，想必也是生活中的一大乐事。

有些人读书，是为了攻克技术难题，图一个学术上的发展机遇；有些人读书，是为了提高学业水准，奔一个人生中的美好前程；还有些人读书，是为了积累知识储备，求一个素养上的良好修饰。这样的读书，始终是带着功利性的，灯熬尽了，黑发成霜。而闲读不是这样的，随意翻翻，任性读读，思绪不枝不蔓，身

心无牵无挂，如清风徐徐，暖阳灿灿，安逸而自在。

闲读，是一种身体上的放松。凡人生活，总是逃脱不了人间烟火的困扰，家庭的琐碎，工作的劳累，日复一日，让人从身体到身心都觉着疲惫不堪。奔波忙碌之余，手执一卷，或坐或卧，让一颗躁动的心沉静下来，慢慢走进文字里的世界，山在眼前巍峨着，水在眼前灵动着，茵茵花香，啾啾鸟语，指尖在泛着墨香的书页上柔柔滑过，身体放松了，身心休憩了，闲读的每一段光阴，无不萦绕着静与美的享受。正如诗人顾城所说的，“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，不说话，就十分美

好。”闲读也是这样的。

闲读，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。读书，对于好多人来说或者是个“苦差事”，而闲读不是这样的，简单而快乐，是一种精神享受，像呼吸一样自由，像花开一样芬芳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，“喜欢读书，就等于把生命中寂寞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。”枯燥烦闷时，闲读能使人心情愉悦；迷茫惆怅时，闲读能使人思路清晰；高兴快意时，闲读更能使人享受生活。闲读，塑造的是人的精神，升华的是人的思想，精彩的是人的生命。

闲读，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洗礼和心灵，总要有一个在路上。”人

生如书，书亦人生，读书，哪怕只是闲读，都是一场心灵的修行，淡澈如初。读书能使孤独变成一种享受，能使闲暇变成一种充实，能使幽静变得烂漫多彩，能使嘈杂变得宁静和谐。闲来读一本闲书，书中的每一段文字都散发着幽香，熠熠着的是人性之光，彻照着人的灵魂，洗礼着人的心灵。

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“人不管走到哪一步，总得找点乐子，想一点办法，老是愁眉苦脸的，干吗呢？”汪先生的这句话是为生活而写的，闲读或者就是生活中的“乐子”，捧读一本闲书，打发一段闲暇的时光，生活里便有了无尽的乐趣。

读书“知入”与“知出”

张运辅

怎样读书才能取得效果？经验表明，处理好阅读中的“入”与“出”是关键所在。南宋学者陈善《打虱新语》云：“读书须知出入法。始当求所以入，终当求所以出。见得亲切，此是入书法；用得透脱，此是出书法。盖不能入得书，则不知古人用心处；不能出得书，则又死于言下。惟知出知入，得尽读书之法也。”此论道出了读书的精髓。

阅读中的“入”，是指对所读书之全身心融入，潜心对其进行研读与探索。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说：“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，观文者披文以人情，沿波讨源，虽幽必显。”叶圣陶也认为：“文字是一道桥梁，这边的桥墩站着读者，那边的桥墩站着作者。通过这一道桥梁，读者才和作者会面，不但会面，而且了解了作者的心情，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。”这说明阅读中的“入”，就是读者通过文字去触

摸作者的内心，与其进行心灵的对话。如此“入书”，方可“见得亲切”，实现双方心情的“契合”。

阅读双方该怎样实现心情的“契合”？一个方法是坚持“精思”。朱熹认为：“大抵观书先须熟读，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。继以精思，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，然后可以有得尔。”就是说阅读要慢嚼细咽，通过揣摩语言，达到把握文章内容、体悟作品意蕴与情趣之目的。

在熟读基础上精思，确为“入书”之妙诀。苏轼读陶渊明《饮酒》诗后写道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因采菊而见山，境与意会，此句最有妙处。近岁俗本皆作‘望南山’，则此一篇书气都索然矣。”苏轼发现“望”与“见”虽一字之差，但意境迥异。何故？盖因陶诗所表达的是辞官归田后的喜悦之情，故用“见”字来表达的悠然自得之感。若改为“望”，变

为主动寻求，就不但破坏了全诗的意境，而且也与陶渊明的节操相悖。苏轼的体会，表明他对全诗诗意蕴和诗人的心境都有了深刻认识；这种认识若离开了对全诗全身心的“入”，离开反复思索，是无法达到的。

阅读中的“出”，是指读者能站在更高层次，对所读之书作出分析判断，能从新的角度进行阐发、评价和质疑。哲学家叔本华就主张读书要与书本拉开距离，不要“入”书过度，要敢于善于从书本中走出来。这样读书，方可避免“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，我们只不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”；方可在读后能解其意、识其旨、得其要，真正做到“用得透脱”。明人王骥德《论读书》说“作诗原是读书人，不用书中一个字”。这话也充满辩证法，值得揣摩与深思。

鲁迅早年读过不少进化论书

《大学》“絜矩之道”即是管理智慧之精华

吴一帆

自认一介书生，未尝自诩有资格“管理”他人。然而人生于世，难免有“君今在罗网，何以有羽翼”之叹，更兼“水深波浪阔，无使蛟龙得”。于是随着遭际变化，我亦不由自主思虑起管理之道。依旧是不想当领导的闲散之心，不过此番思虑，竟会引人人更为开通的境界，不拘泥在个体，亦关乎周遭世界。

我没有管理学知识基础，走马观花过眼些许，却也是偶有“鸡汤”般的心得，有用，却只是有用罢了，索然无味。直到一日无意间翻阅家喻户晓的儒家经典《大学》，开篇尾论“絜矩”，惊讶这不就是最高明的管理之道？放在今日，管理任何一个团队，依然适用，且与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各类鸡汤相比，竟是如此切中要害。

《大学》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，全篇仅2,100余字。与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列，位居儒家最为推崇的“四书”之首。在《大学》接近尾声的部分，谈到君子的“絜矩之道”。“絜”是“度量”“衡量”的意思，“矩”是木工画方形的曲尺，引申为规矩之义。“絜矩之道”顾名思义，可以理解理解为儒家道德规范的法则。不过，“絜矩之道”这一部分论述，同时竟也是十分实用的管理及用人法则。

《大学》对“絜矩之道”具体的解释是：“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。”与《论语》中孔子讲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一脉相承。但“絜矩之道”更关注体系的运转，侧重上下级相处的层面，翻译成白话文即：“如果你厌恶上级的某种行为，就不要用来对待下属；如果你厌恶下属的某种行为，就不要用来对待上级……”

人际交往中，人们常常受到类似关乎同理心的教导。但身在譬如职场这样的名利场，尤其当今社会竞争如此激烈，人的行为往往全由名利主导，看待人与事的角度也随地位立场而变，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，很受局限。职场人，无论身为领导还是普通员工，少有人在处理与上下左右的关系时，还能够记得去遵循这样的“絜矩之道”，由此更加剧了名利的拉扯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其实，虽然内在精神一致，但推己及人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期许，儒家“絜矩之道”之“絜矩”与“道”，却是很明确的规则，换言之，可行性很强。“絜矩之道”在儒家“君子慎乎德”的道德传统内提出，却多少带上墨家乃至法家实用主义行事风格的

色彩。“絜矩之道”淋漓尽致地诠释着儒家“反求诸己”的自律精神，故而可以看作自律这件事有章可循的良方。

《大学》对“絜矩之道”的定义本身，建立在“上下”“前后”“左右”貌似对等的相互关系。不过从篇章所举的例子看，明显更强调居上位的“君子”以身示范的作用。这在今天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胸襟与担当足够，才有居上位的资格；地位愈高，责任愈大。否则德不称位，便是自取灭亡，在今天这依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。“絜矩之道”列举古圣贤例，言语寥寥，文辞琅琅上口，说理却可谓苍劲有力。原来流传至今的经典大道，皆有化繁为简的深厚功力。其中一个出自《秦誓》的例子，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：

“如果有一位大臣，忠厚诚实，没有特殊本领，却心胸宽广，有容人之量。看到他人有本事，他感觉就像自己已有本事一样；见到德才兼备之人，他发自内心地欣赏，且不只是说说而已（还会用行动来爱惜德才兼备之人）。这样的大臣还可以把他留用，因为他能够保护我们的子孙黎民，尚且能造福于世。”

随之又举一反例。“如果（一位大臣），看到他人有本事就嫉妒厌恶；见到德才兼备之人，就百般阻挠让人家什么也做不成。这样的大臣是不能留用的，因为不能保护我们的子孙黎民，且这种人是很有危险的。”对于这种心胸狭窄、戕害贤人之辈，素来温柔敦厚的儒家甚至主张“放流之”。

北宋大儒、史学家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：“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”《大学》“絜矩之道”所举上述两例，前者是敦厚之人，但似于才学上略有欠缺，后者则是心术不端的能吏。“絜矩之道”选择留用前者而摒弃后者，足见德在才先，德方为“帅”。

不过这也是有底线的，并不意味着要任用一味追求空泛的道德完美，而无实际才能的滥好人。前一例“无他技”，说明满足分内之事的技能还是有的，且能够识人之贤与不肖，处事明辨是非，正是做人、做领导的大智慧，实则堪当领导之位。后一例的不堪任用，不必多言。“絜矩之道”随之要求仁人“要”“爱人”，“见贤能举，见不肖能退”，这就提出了对个人智慧和正义人格颇高的要求，多少又颠覆了我们向儒家温柔敦厚的印象。原来，儒家也是有锋芒、爱憎分明的。

这样的团队管理、为人处世之道，着实值得借鉴，而且，中国的古人居然在经典中不费多少笔墨，就讲得清清楚楚。